

●王宗义

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图书馆活动

——兼论“公共图书馆理念”

摘要 城市化进程造就现代文化教育活动环境。在经济全球化与城市化交织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环境中,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要素是多元的,公众实际需求的具体把握应该比寻求建设资金更重要,应以公众需求满足来检验图书馆的社会效益。对现代图书馆发展研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导引。参考文献7。

关键词 现代图书馆 图书馆活动 城市化进程 社会发展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Social urbanization creates moder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al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re are pluralistic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and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now the needs of the public than to seek development fund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earches on modern library development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nal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7 refs.

KEY WORDS Modern library. Library activities. Social urbaniz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CLASS NUMBER G250

人类社会的文献管理与利用活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活动只有三四百年光景。区分古代文献管理利用活动与近现代图书馆活动的标志,以是否向社会公众开放为标准。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图书馆模式就是近现代图书馆共同的活动形态。

近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居民集聚的城市化生活方式。城市化生活改变了社会文明的形态,城市化过程也孕育了现代社会的众多公共活动模式。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活动,在人群集聚的城市中形成了社会需求,并得到长足发展。

社会公共事业植根于城市生活方式。现代经济活动环境促使城市社会成员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生存环境。城市居民共同的需求支撑着规模化的公共文化教育事业。各种类型与层级的学校、图书馆,共同组成了社会的文化传播系统,现代图书馆也因此成为城市居民文化学习、知识更新的重要公共设施。

图书馆活动作为社会文化教育事业的一部分,其公共性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图书馆的不同系统隶属及其管理区分,仅仅源于读者群需求差异的专业分工,以及因此引发的各种管理规则变化,但

不会改变现代图书馆所承担的公共文化职能,也不会让图书馆的公共服务方式出现本质变化。

1 城市化进程造就现代文化教育活动环境

1.1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进步的特定发展阶段

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城市化进程。机械化大生产方式导致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失去产品市场的手工业者进入了专业分工日趋强化的现代化生产流程,原先分散在各地的小生产者由此向工业生产中心集聚。在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城市迅速转型和膨胀,以工业基地为中心的新兴城市也因此大量出现。

全球不同地区的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表明,城市化生活方式是社会进步过程中的一种共同趋势。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社会活动方式向城市化生活形态转化的历史。

1.2 城市社会孕育了规模化、集约化的公共文化事业

工业化背景下的现代城市居民群体迅速扩大,以工商业雇佣劳动者为主体的市民大众,形成了大量的文化学习和知识更新需求。在城市居民群体大规模的发展需求推动下,文化教育活动的规模化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工业化时代萌生的城市公共文化教育活动,必然地打上了机械化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烙印——集约化模式;现代学校教育中的所有学生按年龄分班集中上课,教师以集体考试的方式统一测试学生的文化掌握程度,这无疑是社会教育资源获得最大利用效益的一种活动方式。同样,将社会公众各种现有、潜在利用需求的图书资料集中存储,通过专业人员整理有序,让有文献获取需求的社会公众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获得自己所希望利用的书刊,现代图书馆活动也因此成为社会文献资源达到利用效益最大化的一种基本方式。

专业分工不断细化的大工业生产环境中,社会物质产品运动客观地选择了市场交换为最佳经济模式。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公共教育文化活动,也必然蕴涵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以最小的社会发展投入,获取最大的社会活动效益。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各种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它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悄然决定着其他各种社会活动方式的发生和发展,但人们的直觉往往意识不到。先哲们称这一规律为“看不见的手”,原因就在于此。

1.3 现代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活动的基础构成

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公共文化教育活动涵盖了面向少儿的文化普及教育,面向成年人的专业技能和在职教育,以及面向城市居民各自发展需求,以知识补充和自我更新为主要方式的图书馆社会教育,这也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将图书馆事业纳入教育行政管理的原因。

现代图书馆活动包含着文献集藏、资源整序、社会教育、文化服务等基本社会职能。其中的前两项职能,是自古以来各种文献集藏管理机构始终具备的。在资源变化和技术进步的现代社会环境中,图书馆活动内容不断地增加和丰富,后两项职能是现代图书馆区别于古代文献管理活动的主要标志。

相对于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和高等、专业学校的专业和技能教育,现代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教育功能及其价值无论如何强调,依然是一种相对的辅助功能。但在社会公共文化活动的分工中,现代图书馆活动的内容已经极为丰富,切实兼顾与履行好四项职能已属不易,为求得自身地位的提升而片面强调某些功能,就可能脱离真实的社会生活。

2 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图书馆溯源

2.1 西欧社会的文化氛围推动了现代图书馆普及

欧洲中世纪封建诸侯之间的利益争夺自然地强

化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科技知识在诸侯争斗中的作用凸显,使得知识分子的地位也自然地优化,在公众生活中的话语权相应增加,并挑战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者——贵族与僧侣阶层。培根的著名论断“Knowledge is Power”,无论翻译为“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知识就是权力”,都是对这一特定时期社会现实的精辟概括。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处于城市底层的劳动者家庭也开始重视阅读和藏书。对18世纪初英国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调查发现,工人家庭藏书状况已经相当普遍。他们世代积聚藏书的统计数据,往往使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调查者感到意外。18世纪中期的法国,图书馆已是城市文化生活基础设施之一。当时法国城市图书馆中普遍设有两个并行的空间,一个是阅览室,另一个是谈话室。读者首先在阅览室里阅读书籍,然后去谈话室作阅读交流。21世纪的图书馆员很难想象这样的氛围,因为图书馆史中很少留下记录。18世纪前期的法国城市居民中,文盲、半文盲占了一半以上,他们的人际交流主要在咖啡馆,或是自己阅读报章,或是与能够读报的人交谈以获取社会生活信息。这样的文化现象在当时西欧各国相当普遍。了解这些史实或许可以对公共图书馆活动发展所必需的社会氛围加深认识。

18世纪中期以后,西欧各国城市中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大量增加,保障公共图书馆活动的法律、法规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并最终成为城市公共文化生活的基本构成。

西欧各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图书馆的规模化形成,表明现代图书馆发展的基础首先在于公众文化环境的成熟,其次是公众需求的实际把握。值得当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研究关注的:一是城市公共文化发展需求与满足,不只是单一的公共图书馆建设,而是多种文化教育活动的协同;二是公众的文化需求具体而多样,必须根据不同居民群体的各种需求,科学地配置发展资源。

2.2 东亚社会现代转型中的图书馆内涵嬗变

有着接受外来文化历史传承的日本,社会转型首先取得了成果。作为现代社会文化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公共图书馆样式的整体移植是其中之一。

在引进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过程中,日本也曾经历过波折。起初,日本的借鉴对象首选了发展相对较快的美国模式,但两年后却以失败告终。分析其原因为两点:一是日本社会的发展水平很低,公众缺乏获

得文化的主动意愿；二是美国的自由主义社会模式，对社会发展目标的实施缺乏强制力。于是，日本转而效仿德国的国家主义模式。通过政府行政干预，强力推动公众文化教育的现代化，在短期内实现了教育文化普及目标，公共图书馆制度也同时建立起来。今天，人们关于日本图书馆体制的研究对日本图书馆法规的完整性十分羡慕，但很少追溯日本现代图书馆体制的渊源，也未注意到这一体制下图书馆活动内涵的嬗变。

同样，很少有人注意到以日本成功模式为借鉴的中国和东亚各国，对现代图书馆的称呼都悄然出现了变化，或称为“公立图书馆”，或直呼为“官立”、“官办”图书馆。它意味着东亚社会的公共图书馆大多为政府投资举办。这种名义上的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其内涵已很大程度地转化为城市公众文化福利事业，与欧美社会进步过程中自然发生发展的公共图书馆活动，已经有着本质的区别。

掩盖在“公共图书馆”共同称谓之下的本质差异，必然导致当代图书馆活动研究中，欧美图书馆活动的发展理念往往很难被东方社会的图书馆实践接受；东方社会图书馆发展的各种问题与思考，也常常不被西方图书馆界理解。其奥秘就在于在共同的“公共图书馆”旗帜下，各自的社会文化内涵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差异，当代中国图书馆实践中的种种理念“背离”，也就不难理解。

2.3 上海地区现代图书馆发展路径的启示

中国现代图书馆活动主流自然属于东亚社会模式，包括清末开始出现的“国立”、“省立”图书馆，以及民国时期隶属于“民众教育馆”内部的图书馆（室），全国大部分地区面向公众文化服务的图书馆设置，实际上都是教育行政活动的一个组成。政府管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东方社会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表现。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地区图书馆活动曾经有过一段与国内大部分地区不同的发展经历。其中一些类似欧洲近代图书馆发展进程的事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差异。

20世纪初期上海地区的现代文化教育活动，大多由欧美各国民传教士将本国模式分别移植引进。以教会等团体为主体组织的教育文化活动，首先建立了各种中等职业学校，进而扩展出初等普及教育和高等专业教育，各类学校设立的图书馆没有是否对外开放的问题，社会各界的书刊需求都可以在那里得到一定

的满足。著名如圣约翰大学的博物院、图书馆等，从来没有冠以“公共”的名义，但始终是提供公众文化服务的场所。

公共文化发展的西欧模式也相当清晰，工部局图书馆就是一个案例：1849年创办时名为“Shanghai Book Club”（上海书会），是外国侨民的一个社区互助读书组织。两年后发展成为会员制的公共文化机构，改名“上海图书馆”。以后因规模不断扩大而辗转搬迁，馆舍一度设在工部局办公楼内，馆名也按照欧洲城市文化活动的惯例，称为“市政厅图书馆”。初期30年的图书馆资金均由会员捐助。1878年，因为图书馆规模扩大，会员捐助方式难以为继，遂向民间文化组织“上海运动娱乐基金会”申请资助，在获得500两白银的同时承诺开放社会服务。3年后，租界纳税人会通过决议，每年向图书馆提供白银200两的定期资助，而图书馆则相应提供每天8小时的公众免费服务。以后随着图书馆服务人群的扩大，资助同步提升，至1894年达到白银1000两。1900年起，工部局把资助图书馆款项列入教育补助经费项目直接拨款。1912年工部局正式接收图书馆，年服务1万人次。

另一个是“未完成式”的案例：20年代初，进入上海地区工商企业的内地移民大增，各工厂、商店的众多青年学徒、店员形成了庞大的文化补习需求，而租界内面向华人的社会文化服务设施明显不足。上海总商会募捐创办了服务这一群体的公众图书馆——商业图书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商业图书馆发展成为租界华人获得文化服务的主要场所，1933年服务量达到3万人次。租界纳税华人会遂通过租界董事会的华人董事提出议案，要求商业图书馆应与工部局图书馆同等获得资金补助。外侨成员占多数的董事会虽然不情愿，但只能在程序上设置障碍拖延议案的落实，终不敢公开反对。若不是日本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上海地区应该会出现一个本土化的西欧发展模式的公共图书馆。

20世纪50年代起，所有的文化教育活动，包括各级各类公共图书馆都进入了严格的行政管理范畴。在政府规划指导下，所有图书馆按照读者的不同来源，分别列入社会文化、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所等3个主要系统。各个系统、机构的图书馆按照规定范围的用户需求，向行政部门提出经费要求，并组织图书馆运作。从常规角度思考，这样的计划指导模式似乎是资源利用的最佳形式。但事实上，城市文化活动中特有的公共性内涵，却在分类管理的操作中被不经意地

消解了。实践结果是各级各类图书馆画地为牢,各自集藏的文献资源失去了社会充分利用的可能。到50年代中期,图书馆文献利用率低的状况就已经被人们认识,但系统分割的体制束缚,导致这样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文献资源建设的发展投入被大量空耗,并最终成为影响图书馆获得社会持续投入的根本障碍。只是因为它是以“看不见”的方式发生作用,图书馆界难以觉察。

3 信息化、全球化社会环境与当代图书馆活动前瞻

3.1 无限的社会信息环境与图书馆活动选择

数字化与网络化使得以文献信息处理利用为基础业务的现代图书馆活动获得了无尽遐想的空间。一二十年来,专业前景的瞻望始终让图书馆员迷惘于乐观与悲观的预测之中,彷徨于兴盛和消亡的前景之间。从信息爆炸到知识组织,从信息的数字化到服务的网络化,从知识组织到知识喷泉,各种技术的、文学的创新语词如潮涌而来,编织了无限理想的图书馆发展空间;同样,知识的数字化生产与发布,信息的网络化整理与传递等冷峻话语,也不断地演奏着图书馆走向消亡的悲歌。

从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俯瞰社会文化交流,立足文献与信息的社会利用进行思考,可以发现信息交流是一种社会自然现象,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信息交流范畴无法人为界定。难以计量的社会与人群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物理载体无限制地传送着,由此而汇聚成的所谓“社会信息资源”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客观描述,它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应用数字化,乃至更新颖的技术手段全部记录并保存下来。社会的文化进程和自然界的大小河流一样,都有着自净功能,存优汰劣的自然与社会发展规律,将最终决定不同文化和文献的传承选择。任何主动干预或许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料。当代图书馆应将注意力集中于服务社会需求的具体课题。

面对多种物理形态的文献或信息载体,当代图书馆专业活动依然应该立足于文献资源的管理与利用。现代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教育功能也需要整理有序的文献资源给予基础支撑。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支持下,满足读者群体知识自我更新等需求的图书馆文献服务功能将得到更有效发挥。“知识服务”、“个性化服务”等是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的积极思考,但进入具体实践领域就必须严格地界定范畴。任何理论前

瞻都不能离开社会文化分工规定的图书馆活动四项基本职能,单一发展的极端思维或许才是引导图书馆走向消亡的最大威胁。

3.2 全球化与城市化交织中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环境

中国社会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正通过经济、文化、技术等强大力量裹挟着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一起进入全球化潮流。工业社会的城市化和信息社会的全球化令当代中国社会面对着平行交叉的发展境遇。辽阔的疆域以及东西部不平衡的社会生态更为发展研究添加了难度。研究未来社会的图书馆活动,需要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和国际图书馆专业的最新进展,更需要顾及中国社会的特定人文与时代背景。清醒认识事业发展与社会制约的一些基本事实,才能为当代图书馆发展提供科学理性的导向。

(1)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将更加突出,缺乏现代社会活动效率的农村人口将成为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的重要因素。扩大现有城市和新建城市,是从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入手,让这部分社会成员转化为社会发展积极因素的必由之路。在国力总体薄弱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首先重视物质领域的投入是一种必然,公共文教活动在理论上的重要性终究须让位于直接的物质生活需求,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无须讳言的客观现实。

(2) 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必将加剧文化教育资源的紧缺状况。当代社会机制决定了发展资源基本集中于行政管理系统,发展压力也自然为政府承担。“十一五”期间基础义务教育投入将完全由政府承担,这无疑是走向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的另一效应是需要获得基础教育的人群,将进一步向有着教育资源优质内涵的城市集聚,城市发展投入中用于基础教育的部分必然持续增长。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环境中,城市居民的职业技能教育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巨大发展需求。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下,中国城市公共文化教育领域的政府投入将更多地集中于直接教育领域,处于辅助地位承担社会教育职能的图书馆,行政投入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相对削弱。这也是图书馆发展研究需要清醒认识和理解的现实前景。

(3) 欧美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进程表明,公共文化教育的发展投入可以由多途径实现。发达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行政性投入大部分用于教育事业,而各种

社会文化活动则多半通过市场方式运作。文化产业运作积累的资金又在行政导引下反馈于公众文化生活,形成了社会文化发展资源的良性循环。我国城市的文化产业改革刚开始,产业化运作模式尚未建立,对公共文化的反馈自是未定之数。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地区的公共图书馆三级网络建设已是多次反复,新世纪初深圳的“图书馆之城”建设,效果亦差强人意。两个沿海发达城市的实践得失,需要引起专业研究者更深入地思考。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要素是多元的,公众实际需求的具体把握应该比寻求建设资金更为重要。

3.3 以公众需求满足来检验图书馆的社会效益

当代城市图书馆用户量上升很快,但分析文献利用内容可以发现,言情、武侠小说等休闲性阅读和语言、计算机类文献等功利性阅读占绝对比重。在图书馆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这样的利用效果并不是社会健康发展所期待的。

相关调查表明,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书刊来源首选为大型书城,那里能获取最新图书;其次是街头的书报亭,那里能得到时尚报刊;中小学生课外阅读的主要来源竟是地下租书点,那里有混沌初开少年为之入迷的“口袋书”。

还有各种公开的社会文化调查数据表明,发达地区城市居民的年人均购书支出一直排在全国各省市前列。

事实表明,公共图书馆的文献服务与社会需求有着相当的距离,而借阅人次的单一增量掩盖着图书馆整体功能的缺失,也表明社会给予图书馆的投入与真正的社会效益之间有着很大空间。在城市大多数居民尚处于“文化脱贫”的发展阶段时,以信息平等一类奢谈指导专业活动,简单做出敞开大门、降低门槛等平民化姿态,只是平白增加图书馆管理成本,对于提高图书馆活动的社会效益毫无意义。中国城市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应该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分工所赋予的教育职能。

现代图书馆作为公众自我教育和知识更新的场所,它的教育功能体现在图书馆用户通过文献的阅读和利用,既能获取各种具体科技文化知识,也能在个人文化修养上获得进步。让图书馆用户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助力,这应该是图书馆社会效益评价的真正落脚点。图书馆需要强化文献馆藏与利用的科学规范,出版领域的鱼龙混杂状况不应该在公共文化服务

机构中再现。同时,囿于意识形态的陈腐观念和盲目尊崇自由主义的洋教条,都是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发挥的障碍。

4 结束语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生活方式,产生了规模化的公众需求,推动了公共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形成。规模化的教育文化事业铭刻了大工业生产模式的集约化运作时代印记。规模化、集约化的公共文化教育活动也内涵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以最小的社会发展投入,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社会文化教育活动组成之一的现代图书馆发展研究,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导引。

对于现代图书馆活动规律的认识,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图书馆活动与社会文化进程的联系与相互作用;二是本地区图书馆活动的自身规律的探索。前者为图书馆的社会价值研究,后者则是文献管理科学的现实课题。

当代高新科技正在改变社会的信息交互方式,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使公众主动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文献生产、管理与利用形式也在变化,图书馆活动在未来社会分工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一个长期课题。其中重要的是,认清社会发展进程中文献运动的总趋势,保证专业活动重心不发生偏移。能做到这一点,图书馆活动将与社会同步发展;若放弃社会科学分工领域,图书馆将会淹没于无边无沿的信息潮流。

参考文献

- 1 杨威理. 西方图书馆史.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2 《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 3 罗梵等. 法国文化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4 《上海租界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租界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 5 杨薇. 日本文化模式与社会变迁.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1
- 6 钱乘旦.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 7 夏光. 东亚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 北京:三联书店,2005

王宗义 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杂志》常务副主编。通信地址:上海淮海中路1555号。邮编200031。

(来稿时间:2006-03-22)